

文学理论的 未来



〔美〕拉尔夫·科恩 主编

程锡麟 等译

万 千 校

本书由美国著名学者拉尔夫·科恩主编，欧美二十余位文论名家联袂撰文，对文学理论在90年代乃至下世纪的发展态势和走向作了前瞻性的预测和研究。该书以其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和信息量，而被誉为“理论批评的里程碑”。

WENXUE LILUN DE WEILAI

10

1000

文学理论的未来

〔美〕拉尔夫·科恩 主编

程锡麟 王晓路

译

林必果 伍厚恺

万 千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038337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万小器
责任校对：陈 松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张汉林

文学理论的未来

Wenxue Lilun de Weilai

程锡麟 等译 万千 校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2 插页 357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04-1118-9/I·119 定价：8.4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世纪 80 年代的欧美文论由于受到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其它非文学学科成果的影响,加之其本身的自我嬗变和更迭,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态势。在这种状况下,欧美文论的整个框架、体系和功能在 90 年代和下个世纪将怎样变化和取向,自然成了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由美国著名学者拉尔夫·科恩主编,欧美二十余位文论名家联袂撰写的这部文集,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切入,对这一问题作了权威性的回答。本书被誉为“批评理论的里程碑”。反映了欧美文论的最新成果和信息。

目 录

序言	(1)
----------	-----

〔美〕拉尔夫·科恩

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	(20)
---------------------	------

〔法〕埃莱娜·西克苏

“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	(43)
-----------------------------	------

〔美〕海登·怀特

历史的世界,文学的历史	(79)
-------------------	------

〔加〕布赖恩·斯托克

批评艺术的状况	(99)
---------------	------

〔美〕杰弗里·哈特曼

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	(121)
------------------	-------

〔美〕J.希利斯·米勒

我的祸福史或: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	(133)
---------------------------	-------

〔德〕汉斯·罗伯特·尧斯

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	(153)
-----------------------------	-------

〔美〕凯瑟琳·R.斯廷普森

镜与妖: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	(177)
----------------------	-------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

苏珊·格巴

权威、(白人)权利与(黑人)批评家;或者,我完全不懂	(210)
----------------------------------	-------

〔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自 治与同化.....	(242)
〔美〕伊莱恩·肖沃尔特	
走向文学人类学.....	(275)
〔德〕沃尔夫冈·伊塞尔	
理论的未来：拯救读者.....	(301)
〔英〕克里斯托弗·巴特勒	
理论在文学教学中的未来.....	(329)
〔美〕杰拉尔德·格拉夫	
保罗·德·曼对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贡献.....	(353)
〔美〕乔纳森·卡勒	
类型理论的未来：功能和构建型式.....	(369)
〔英〕阿拉斯泰尔·福勒	
美的科学与批评的未来.....	(391)
〔美〕阿瑟·丹特	
文学类型与文本类型性.....	(412)
〔法〕让-玛丽·谢弗	
一种幻觉的未来.....	(437)
〔英〕罗莎琳德·克劳斯	
译后记.....	(453)

序 言

[美]拉尔夫·科恩

我在反复阅读为本选集所撰写的这些富有创见的论文中，感到自己正在目睹一个转变的过程。似乎原先作为模式建构、作为含义的假设、受到“依据”及“材料”支配并受到“有效性”检验的理论概念，正转变成新的关于其本身的，关于依据、模式建构的含义以及有效性的概念。这就犹如一个人在观察一条幼虫变为蝴蝶的过程一样。每一类理论写作的形式都有着自身的模式和功能，然而却都与先前的形式存在着联系。

为什么要编选这部选集呢？因为，人们正处于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因为，人们需要检验理论写作为什么得到修正以及如何经历着修正。因为，人们要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因为，理论写作随着其结构的转变不但能具有认知功能，而且还能具有审美功能。

全书所收各文密切相关。然而，要对各文所涉及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述却是一篇短短的序言难以办到的。因此我希望能将自己的意见限定在各文所内含的一种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础上。我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由于诸多文学理论家在讨论文学变革的时候，只依据范式变化的科学模式、或是认识变化的文化模式、

或是社会变化的政治模式，而不是依据与文学理论与实践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的模式。正如汉斯·罗伯特·尧斯在他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理论中的变革产生于先前理论中的空白，产生于对当前理论提出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对理论新的质疑。

本书的撰稿人在讨论当前的以及初露端倪的理论趋向时，所使用的术语并不都是通常模式中的那些易理解的术语。我选择了理论变革的四个方面来说明其走向：Ⅰ. 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Ⅱ. 解构实践的相互融合、解构目标的废弃；Ⅲ. 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Ⅳ. 新型理论的寻求、原有理论的重新界定、理论写作的愉悦。

Ⅰ. 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

不言而喻，女权主义和黑人理论家是大规模政治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旨在要求平等，在市场竞争、社会空间、政治舞台、教育机构等各个方面一律平等。因而，女权主义和黑人文学理论家反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文学研究现状的、得到公认的理论。这些理论家由于愤然反对那种排斥异己的做法、反对那种蔑视或否认其它可能存在的传统的文学传统而显得极有分量。而当这一类理论家或持赞同观点的人进入学术领域并进行理论建构时，他们就对业已确定的理论及排斥异己的传统做法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把文学“理论”与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重新对理论加以界定。于是，文学理论对于像小亨利·路易斯·盖茨这样的黑人批评家来说，就必须对黑人所固有的传统及其普及性加以认可并予以证实。

我们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黑人文化对“理论”本身进行重新界定，我们绝不承认这一种族主义的前提，即理论是白人从事的事情，而我们则注定只能去模仿白人同行，与十九世纪黑人剧团中由白人扮演

黑人相反，现在黑人批评家要以白人面孔出现。我们都是批评理论的继承人，然而我们黑人批评家同时也是黑人固有批评传统的继承人。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创立并运用我们自己的批评理论、假设我们自己的命题，要作为美国黑人社会和文化整体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屹立于学术界之中。

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同样寻求着对文学理论的重新界定，以使其能够提供有关性别差异及其文学影响的整体概说，从而使理论对男女读者、作者之间的性别与文化上的差异作出反应。盖茨的论文与几篇女权主义的论文阐明，作为“意义”模式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掩盖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并忽略了种种成为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读者及作者特征的传统上的差异。

他们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不仅仅是由于目标的变化所致，而且还由于其他的成分所促成，如有关剥削与压迫的自传和轶事，对性别及文化差异的讨论等等。这一修正了的概念将理论对社会及政治见解的影响作为争论的中心，尽管它也不否认理论需要一定的概括力，需要研究具体的作品。一般来说，文化批评家寻求的是使读者自己意识到作品强加给他们的观念形态。在这一方面，女权主义和黑人文学理论家往往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联系在一起，去追溯和描述阶级冲突和剥削的过程。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家还将自己与精神分析学家——尤其是拉康——联系在一起，以建构自身的新理论。

读者将通过凯瑟琳·斯廷普森、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以及伊莱恩·肖沃尔特等人的论文清楚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和文学的分析是多么深奥，又是多么中肯并富于启迪。尽管这些论文对性别差异有着一致的意见，然而对方法、女权主义传统的本质、妇女之间的差异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从凯瑟琳·斯廷普森的论文中摘录一段有关女权主义理论范围的文学：

一些最有力的女权主义批评表明了许多妇女作家的权限范围，表明了她们与处于这种权限之外的女性或男性读者的距离。在七十年代，尽管伍尔夫式的疑虑犹存，但对女权主义批评家来说，夏洛特·勃朗特仍是个极有吸引力的人物；简·爱的虚构型传记则是一种原型叙述。然而也是在七十年代，马克思女权主义批评家则揭示了《雪莉》^①中有关阶级的意识形态臆断。时至八十年代，第三世界批评家则指出，《简·爱》是赞同帝国主义“公理”的“崇拜文本”。为什么普莱恩·简要活下去而伯莎就只有死呢？

表明一些女性拥有某种权力就会使把所有女性都表现为弱者的做法站不住脚，一种标榜为女权主义的理论曾荒谬地提出过这一做法。对复杂性的忠实就是对妇女生活的尊重。再则，表明女性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使那些普遍对妇女以及性别差异错误的描述丧失其吸引力。妇女的共性无非是出生的阴错阳差，是染色性的偶然所至。而这一点也能使那种普遍存在的荒谬论点丧失其通常的吸引力。这些转变是一种我称之为“异质性”（heterogeneity）批评方式的前奏。“异质性”对女性而言是她们之间的差异的标记，是确认除去嗜杀成性之外的所有差异——在不同的语言和文本；不同的种族和国界；不同的图腾与禁忌中——并且宽容地忍受这些差异的方式。

这些理论中的社会与政治特征应当被视为是更为广泛的非学术运动在学术中的显示，这些运动竭力将妇女及少数民族在社会上的经济、性别、种族地位加以重新排列。尽管本书撰稿人主要是针对高等学府的读者，但他们实际上仍试图改变普通读者的阅读、思考以及写作的方式。这并不是改变个人的问题，而是使读者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集团，并使他们学会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审视那些维护一个排他性社会的偏见的文本。

然而绝大多数女权主义和黑人批评家的根基都在学术机构中，这一事实对于他们期望改变的更为广泛的非学术界读者而

① 英国女作家夏·勃朗特1849年的作品。——译注

言，就限制了他们的词汇和贡献。这表明了一种迄今悬而未决的悖论；它已成为理论的未来尚待解决的难题。这一悖论没有比在大学讲坛上更为明显的了。大学生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文学观点和词汇。在这种环境下，持相反观点的批评家往往发现自己在主流领域中受到欢迎，而且他们还发现，自己所采用的某些对立词汇也受到一些并不认为自己是反对派理论家的青睐。高等学府惯于修正并阐明相反观点的本质，这可以从盖茨有关八十年代黑人理论家的作用的观点中看出来：

在我看来，我的任务就是要有助于确保黑人和第三世界的学生（包括白人学生）学到黑人和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文学，这类课程应当由迄今白人占主流的文学系中的黑人、第三世界以及白人教授担任。并且还要培养大学生和研究生清楚地去思维、阅读甚至写作，帮助他们揭露那些捏造语言的惯用手法、骗人的主张、难以自圆其说的论点、空洞的说教以及邪恶的谎言。而这一切正是我们民族所一直蒙受的不幸，这正如我们在经济地位中等于零，而在形而上的体系中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些就是应当通过黑人批评理论传递的“价值观”。

依据盖茨的观点，学院派黑人批评家的作用是与像杰拉尔德·格拉夫一类的白人批评家的作用有所区别的，不论他们的反对派观点有多么一致，其作用都是不同的。格拉夫把大学讲坛视为冲突和调解冲突的竞技场。高等学府对完全反对理论教学的教师以及对理论加以实践的教师均能兼收并蓄。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因为他们相信娱乐性阅读或对文学文本中难以仿效的特点进行分析与理论教学关系不大），格拉夫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一阻力的理论内含：

教师关于一部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或未表达的言论，都包含有一种理论——阐明文学是（或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有教学价

值，其原因何在；这些作品应当如何去解读，它们哪些方面最值得注意，值得特别指出来等问题。

这种在理论中、在表述或实践的变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也同样能在艺术史学者中见到。罗莎琳德·克劳斯在她有关艺术史学者的论述中特别提到了这种阻力：

艺术史家往往回避理论，他们极少阐明自己必不可少的理论主张。诸如历史变迁理论、持续性理论、表现理论、形式作用理论、相关性理论、功能理论以及最重要的证实理论。因为艺术史引以为自豪的是在历史（Geschichte）之前就植根于科学（Wissenschaft）的德国土壤中了。

正如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固执己见的教师们赞成在大学讲坛上推行多元化观点的做法。然而不同观点相互孤立也难以导致变更。格拉夫在竭力反对这一观点时提出了一种教学方式，即对有争议的理论既不要调和，也不要忽视，而使其成为“教育内容中的一部分”。他这个观点得到阿拉斯代尔·麦克因代尔的有力支持，麦克因代尔力主对形成当前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特点的争论予以认可并公开：

一种当代的人文学科教育难免不会成为这些争论的先导，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些争论中别无办法，只能倾向于一方，这种倾向性态度对于我们作为学者和教师的地位来说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我们在学术中的地位的确立除了归功于我们自己外，还应归功于我们的同行和学生。^①

^① 《人文科学与传统冲突》载《阐释人文科学》Ⅱ，伍德罗·威尔逊全国奖学基金，1986年，版第31页。

格拉夫和麦克因代尔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教学，即在细心表明持有某一观点的理论根据的同时，又要对此观点的争论加以精心的说明。其程序是揭示论证批评与理论的思维在不否定由不同目的所产生的其他批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那么在这种程序中，不论一个人在提出某种观点时是多么谨慎，他都会面临一种难以逾越的困境：如何处理两种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观点。

这种变化的思想发生在教学理论中而不是发生在文学理论中。尽管这种方式旨在允许持相反观点的批评家得以发展自己的理论，然而它也同样为保守的批评理论教学开了方便之门。不论这种观点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是如何行之有效，但是它并没有触及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文学理论确实在进行着变化。由此看来，一种冲突模式（conflict model）就有可能忽略对各种理论及观点进行建构的探索。因为理论写作形式所包含的成分，诸如目的、方法、词汇、意象、论点，并不是都存在着冲突。诚然，对于存在的冲突，尽管在方法和论述上存在着差异，但一定会有某些双方均希望取得的成果。

然而克里斯托弗·巴特勒却指出，诸如有关自我理论的变化是一群有影响的人以某种方式谈及人类特性的结果：“我们以自己刻意创造的词汇去描述他或她的方式来创造读者的自我，我们并不试图通过在这两种模式之间作出判断来发现这个自我。”但是，这些新的词汇又是如何创造的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能否避免呢？这无疑文学理论未来的一个难题，不过伊莱恩·肖沃尔特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答案，伊氏在界定观点相左的女权主义及美国黑人理论之间的联系时指出：

在我们同西方文学传统的对抗中，女权主义和美国黑人批评都把个人的、理性的及政治的问题汇集起来了。我们在这两种批评运动的建

构中都遵循了传统的模式,从产生于投身一种抗议运动的独立的文化美学伊始,到与学院派文学理论相结合,对具体的文本背景予以专业化的关注的中间阶段;再到一种扩展的、多元的批评领域,对性别或种族差异加以鉴别。我们与同性恋和后殖民地时期的批评家有着许多共同的批评隐喻、理论和困境,诸如双重声音话语的概念、面纱、面具或壁橱的意象,以及自足对效仿和不合作主义的难题。

II. 解构实践的相互融合, 解构目标的废弃

可以肯定,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以及乔纳森·卡勒的论文都描述了解构理论的衰退。这一思潮的领袖人物希利斯·米勒写道,保罗·德·曼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里,批评的任务有可能是采用常被称为‘解构’的修辞阅读方法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然而米勒补充道,自从1979年以来,这一任务不仅没有以系统的严密性开展起来,而且“它已经从对‘阅读’的兴趣迁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中(即注重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自我等被认为是外在于语言的事物的关系)。通过其中的一种兴趣的转移(或许是费解的、无疑‘过于确定的’)大大地增强了像拉康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富科主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号召力。

“文学研究与历史、社会和自我等大有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在文学范围内对这些外在于语言的力量和事实作主题的思考的问题,而是文学研究以何种方式提供鉴别语言性质的最佳机会的问题,因为语言性质可能会影响德·曼所谓的‘历史的有形性’(the materiality of history)。在此‘解读’在最留神、最有耐性的修辞分析这个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如何知道某一种特定文本是什么?它说了些什么?它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些正是希利斯·米勒的论点。

而本书的许多文章也正是这样做的——坚持对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阅读。我已在前面引过盖茨的有关论述，同样，在吉尔伯特和格巴对《忽必烈汗》的分析中，以及在格拉夫和克里斯托弗·巴特勒的论文中也能看到有关细读的论述。希利斯·米勒引用了齐纳森·卡勒《批评的未来》一文中的有关论点并对此表示赞同：

对于大众文化的不良影响，必须在另一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批评性思维的教学，或对大众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地位与结构进行分析并揭示在其功能中起作用的种种影响。纠缠于哪些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争论，只能分散对下述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即如何保证教育有利于智力的创造、传授批评性思维、细读以及对叙事结构和符号学机制的分析。^①

上述观点与女权主义和盖茨的观点相比较，就使理论重点中业已产生的变化非常明显了。依据盖茨以及女权主义批评家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论点，卡勒所归纳的注意力分散——“纠缠于哪些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争论，只能分散对这一迫切问题的注意力……”正是在理论中作出变革的关键所在。一种女权主义或黑人文学传统的作品需要作书目学的探索以寻求相应的文本。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使其附属于一种修正的理论的问题，而是可以使这种理论成为可能。因为理论有赖于它们所涉及的文本范围。正如阿拉斯泰尔·福勒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理论的广泛性与穿透力最终仅与它所依赖的阅读相同”。

希利斯·米勒写道，我们“主要的任务、人文学科新的理论基础，就是传授阅读以及有效的写作，而这种写作只能出自或伴

^① 参见《当代批评》，克莱顿·克尔布和弗吉尔·洛克选编，珀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这一观点最后一句如下，“纠缠于哪些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争论，只能分散对下述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即如何采用传授批评性思维、细读以及对叙事结构和符号学机制的分析的方式以保证教育促进智力活动。”

随一种成熟的阅读能力”。这一解构的遗产已体现在旨在抵制解构主义语言及人文观的理论之中。这些理论提出的理论变革并不是全盘否定解构主义。如果我们对乔纳森·卡勒所列举的保罗·德·曼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贡献加以认真思考，我们就会意识到，其中一部分已经融会到那些废弃德·曼有关语法、修辞及语言观点的理论之中。即使理论家们将保罗·德·曼的阅读观点予以采纳，他们也会对此加上这一前提：价值观的臆断左右着阅读。阅读包含了人们希望检验、发现或证实的价值观。特定的阅读是与有争议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阅读甚至可以揭示未曾预料到的价值观。

马萨·努斯鲍姆在依据结构和伦理内涵对亨利·詹姆斯《专使》^①所作的详尽研究中指出，德里达以及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解决文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学讲述了我们，讲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和情感，讲述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以及一切与我们有关的整体性（totality）”。她的论点就是，文学理论需要用伦理观去阐明“文学作品所赋予我们的生活感是什么”，并且应就文本所包含的、但未曾得到探求的价值观提出有关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研究《专使》一类的小说对伦理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理解。一种深刻论及伦理问题的文学理论

趋向于伦理意识范围的姿态，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伦理生活中的那些深沉的因素，这些因素以其暴烈或强度使我们完全位于伦理观之外，不再追寻那种平衡的境界与完美。它可以包括，或至少可以表明，它本身敏于反应的散文所无法进入的宁静。

① 亨利·詹姆斯（1843—1916）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作品《专使》（1903）揭示作者对旧世界文化价值观的看法。——译注

努斯鲍姆的论文所论及的内容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领悟，这种领悟有可能导致一种知识概念的重构，即将“主要”文学文本的结构与艺术性当作在伦理背景下对情感、思想、行为的探求来研究。而且，文学理论与系统的伦理文本相联系就可能控制并扩展这一探索。文学理论在这个方面确实可能对规范的伦理文本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以此来评价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中系统阐述的伦理问题。

Ⅲ. 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理论或其组成部分，已经影响并改变了从精神分析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艺术史等学科的概念，本书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罗伊·谢弗就认为，精神分析的各种流派被支配着证据与结果的各种观点所左右：

每种观点似乎都以其特定的理论内含带来了多少属于不同的类型的现象，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表明了事情向好的方面变化。这就是精神分析派别之间就各自实际效果的争论莫衷一是，难以平息的原因，而且或许是不可能平息的，即使这一问题至今仍值得争论。

谢弗对于分析者和被分析者的论述犹如以一种对读者的特别看法去分析文本结构一样，这使他认为，分析者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析去创造证据。然而谢弗又对比修正道，“理想的分析者绝不急于得出任何结论”。

谢弗本人指出了理论的文学前提与自己精神分析观点中的前提之间若干相通之处：正如文学读者与作者共创一篇文本一样，也可以认为，精神分析者是分析对象文本的共创者；“在这些与精神分析与其它类型阅读所共同拥有的特点中，存在着传统与独特的叙述，阐释方式以及作品治疗效果的混合体”；“一件艺术品